

說文解字探原

第一冊

羅君惕撰

中華書局

羅君惕撰

說文解字探原

第一冊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說文解字探原/羅君惕撰. —北京:中華書局,2013. 10

ISBN 978-7-101-09621-7

I. 說… II. 羅… III. ①漢字-古文字學-研究
②《說文》-研究 IV. H16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10627 號

責任編輯:俞國林 朱兆虎

說文解字探原

(全十冊)

羅君惕 撰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80×1230 毫米 1/16·481 印張·22 插頁·10 千字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 冊 定價:6800.00 元

ISBN 978-7-101-09621-7



羅君惕先生與夫人張雯岫在上海家中（二十世紀七十年代）



羅君惕先生山水畫

出版說明

《說文解字探原》，羅君惕撰。羅君惕先生（一九〇五—一九八四），別號艮厂，生於江蘇鎮江。蒙古族，本姓那。先後任教於暨南大學、英士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學院。另著有《中國漢文字和漢文字學的源流》、《漢文字學要籍概述》、《秦刻十碣考釋》等。其生平、學術思想以及本書撰述之經過、大旨，詳見本書卷首所附《羅君惕自傳》。

《說文解字探原》手稿凡七十五冊，羅先生據手稿分冊及分冊頁碼編製了索引，今據以影印出版，在總頁碼之上也依次標示了手稿的分冊數及分冊頁碼，以「◎」號間之，以便檢索。如口部「啞」字，索引中標示為「八·二七」，表示該字在手稿第八冊的第二十七頁，即可按尋「◎」號上之標碼，在七七九頁檢索而得。

本書出版得到羅君惕先生後人與學生的大力支持，謹此致謝。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一三年八月

羅君惕自傳

羅君惕，別號艮厂，蒙古族，屬巴岳特部鑲黃旗，本姓那。於前清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一九〇五年四月），生於江蘇省鎮江市。祖父名惠元，字子錢，為京口駐防軍左翼協領兼護理都統。辛亥革命時，祖父棄官避難泰州市，改姓羅。父名承謨，字紹錢，為秀才，善書法。我自八歲起，即從父讀書寫字，依次臨摹顏真卿、柳公權、蘇軾諸大家之字帖。年十五，入泰州淮東中學肄業，進而學金石古籀篆隸，又學為舊體詩與山水畫，頗得老輩稱許。年十九，入吳淞中國公學大學部商科肄業，課餘仍自學金石詩詞書畫。其時，由友介紹從江陰曹家達先生學詩詞，又由曹先生介紹得見金石書畫大家吳昌碩先生。大學畢業，獲商學士學位，失業家居。年二十三，娶妻張雯岫，為大姑母之長女，亦蒙古族，屬札魯特部。

年二十五，前中國公學教授黎照寰先生任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召我為文書主任，凡十二年。其時，先後加入上海中國畫會與北京考古學社，遂得交南北書畫家與文字學家。中國公學董事有梁啟超、蔡元培、于右任諸氏，而于氏以書法名海內，我曾以所書鐘鼎文請教於于氏，于氏掀髯點首言：「近二十年來無此作也。」（二十年指中華民國成立二十年）上海書畫家馬公愚嘗遺書與我，謂：「公之書溫穆雅馴，弟傾服已久矣。」其後曾以書畫各一幅，參加日本東京書畫展覽會。我於大篆，頗喜秦刻十碣文。十碣文舊稱石鼓文，向來皆斷為周宣王大蒐岐陽之文字。自宋代起，始有謂秦代刻石者，如鄭樵謂在秦惠文之後，始皇之前；鞏豐謂在秦獻公之前，襄公之後；震鈞、馬敘倫均謂在秦文公之時；郭沫若謂在秦襄公

之時；馬衡謂在秦穆公之時。我則同於鄭氏之說。嘗以十碣文與籀文、大篆（即詛楚文、盪和鐘、秦公毀）、小篆（即秦始皇、二世之刻石如嶧山碑、會稽刻石、琅琊刻石、權量詔書及《說文解字》）比較，其結構與籀文同者八十三，與大篆、秦刻石同者六十一，與許書同者則有一百一，但其文之字體團扁，與籀文、小篆迥異，而與大篆則全同；其文之結構比較簡易，與籀文多異，與大篆、小篆則多同。詛楚文、盪和鐘、秦公毀皆秦惠文以後，始皇以前之物，是以知之。若其詩則佚詩也，因此曾撰《秦刻十碣考釋》一稿，曾將《時代考》一篇於一九三五年刊登於《考古》期刊第三期（容庚主編）。任職餘暇，除撰述外，仍自修舊業，又閱讀五經諸子。於是發生兩個問題，即：自古文、籀文而至行書、草書，字體迥殊，此何由而變？字書所載字義與諸家所注經子，其解釋亦有不同，又何由而變？我百思不得其解，而欲問亦無從。最後以為非研究文字學，不得解決。此我從事文字學之動機也。

欲知字體字義之變，當研究文字學，然欲研究文字學，又當讀何書乎？曾讀《隋書·經籍志》，彼謂文字學當包括形體、意義、聲音三方面是也。今所存最古之字書而包括此三方面者，惟東漢許慎所撰之《說文解字》而已，乃取而讀之。初並句讀亦有不知，疑惑更多不解。於是又取段玉裁之《說文解字注》、桂馥之《說文義證》、朱駿聲之《說文通訓定聲》、王筠之《說文句讀》而讀之，後又泛覽各家之書，有必要則記之。其所記者有五：一，許氏說解之謬誤者；二，我所不知而各家均未論及仍不能解決者；三，各家有獨到之見解者；四，各家所說不同而未能斷其是非者；五，自己之心得體會。如此者四年，所獲較多，始有撰稿之意，但其書名與體例均未能定也。凡四易稿，始定名為《說文解字探原》（以下簡稱

《探原》，而其體例則悉依《說文解字》。《說文解字》首列字形，次釋字義，次定字音。故《探原》亦首以其所列篆書與古代文字如甲骨文、鐘鼎文、大篆以至隸書等相比較，而分出正字、或體、訛字與簡字；次以正字與字書、詞書、韻書以及經籍、子史、文集等等注釋相比較，而分出本義與後起之義或誤解等；次以本義與字書、詞書、韻書、毛詩、楚辭以及漢魏晉時代之韻文所注之音相比較，說明其字從某字得聲之理由，而分出古音、近音或誤讀。凡關於字體者，以甲骨文為第一類，金文為第二類，石文為第三類，餘者為第四類；凡關於字義、字音者，以字書、詞書、韻書為第一類，五經為第二類，諸子為第三類，群史為第四類，各家文集為第五類，餘者為第六類。後人著作，各以類從。文史兩類，苟非必需，皆斷自漢代。此外，凡形聲、表聲之字必兼表意，故許慎有「亦聲」之解，宋朝王聖美有「右文」之說，鄭樵亦有「聲兼義」之論，但均未悉言之。此稿則詳加稽證，務盡獲其兼義。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開始，其後四年，此稿方撰至「言」部，我被迫內遷。乃自上海至金華，在日寇轟炸之下，隨東南聯合大學籌備委員會西至福建建陽。彼會主任何炳松聘我為秘書兼先修班國文教員。越年，又聘我兼任暨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遂獲交大畫家潘天壽，常合作書畫，均為同事奪去，而著作之事乃暫停。一九四二年八月，我又調任浙江英士大學國文教授兼校長室秘書。英士大學設在泰順，有美術科，潘天壽教國畫，我教詩詞書法。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復員回上海交通大學，力辭其他職務，專任國文教授，兼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立信會計專科學校國文教授，餘暇仍繼續撰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我不教國文一科，改教新文學。一九五一年實行院系調整。交通大學廢除語文課，我被調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文系教授。一九五三年四月，由政務院任命為上海市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

一九五四年七月，當選爲上海市第一屆人大代表。同年十月，又調任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以迄於今。一九五五年五月兼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第一屆委員會委員。十月，被選爲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代表，與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教授吳文祺同赴北京出席。其後，在院外則經常參加政治學習與政治活動；在院內，我雖無課可開，亦須每日到院上班，於是撰述之事只能於假日從事。一九五六年七月，被選赴東北參觀，先至北京，曾獲毛主席接見。九月，當選爲上海語文學會理事。一九五八年八月，講授古漢語語法與文字學基本知識。但至一九五九年，掀起教學改革高潮，兩課又告停止。一九六一年，加入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展覽時，馬公愚與諸老書畫家均謂：「篆書當讓老羅。」是年九月，被選赴北京參加國慶典禮，又獲毛主席接見，人以爲榮。

教學改革高潮過後，又重開文字學。在講授後，漢語教研組同事要求我將所講之內容寫成一部講義。所謂內容，即文字學之基本知識。因此，遂又抽出時間編著，閱二年而成，名爲《中國漢文字和漢文字學的源流》（以下簡稱《源流》）。此稿首先討論五大問題：一爲先期文字發展至正式文字之幾個階段；二爲文字創造之人，在原始社會時爲勞動人民，在階級社會時爲知識分子；三爲文字產生之時代當在原始社會後期；四爲文字發展規律，即從表形而至表意、表聲；五爲文字構造方法，即古之「六書」，其名稱與次序當爲象形、指事、會意、假借、形聲、轉注。所謂轉注實與形聲相同，但形聲之形旁不省，聲旁則或省或不省；而轉注之形旁必省，聲旁亦或省或不省耳。以下則先述先期文字之結繩、八卦（按照《周易·繫辭》與孔安國《尚書序》所言，應爲結繩在先，八卦在後；許慎《說文解字敘》則以八卦在先，結繩在後，實誤），以至正式文字之古文（甲骨文）、籀文（鐘鼎文）、大篆、小篆、隸書、楷書、行書、

草書各種字體與古籀篆隸楷之簡體及象形、指事、會意字之聲符，然後再述歷代字書、詞書、韻書以及研究各種字體之專著，除扼要介紹外，更指出其得失之所在。全稿約二十萬字，分兩大冊。完成後，曾與上海出版社聯繫，以其不在出版範圍內，謝不接受，遂束之高閣，仍繼續撰述《探原》。

一九六六年五月，所謂「文化大革命」開始，各高等院校學生均組織紅衛兵。其時，我院學生有三千餘人，中文系最多，有一千餘人。其中有八百餘人組織紅衛兵，屬上海紅衛兵高等院校革命委員會。此會對老年教師之無政治、歷史問題者，皆認為有思想意識問題，俟日後進行批判，故我未被揪鬥，更未入牛棚，人以爲奇迹。我輩每日上午到校學習文件，若無其他集會，即各自回家。於是我每日下午至晚間，可撰述八小時，可探討八個字，工作極爲迅速。越一年餘，張春橋已奪得上海領導權，開始向老年教師進攻。先迫令我輩將所謂「黑稿」（即各人之著作稿本）交出，幸管理之人皆我教過之學生，未加毀損。我雖爲漏網之魚，然亦在排斥之列。自此每日到校上班，非學習文件，即開會討論或批判所謂「走資派」，而撰述時間，又只有晚間與假日矣。至一九六九年十月，上海各高等院校之師生員工均下鄉勞動，我院派在松江佘山公社。每日或學習文件，或開會批鬥，或參加勞動。我時已六十餘歲，夏則烈日灼膚，冬則寒風刺骨，亦不得免。惟每兩星期可返滬一次，休息二日，我僅有此時從事撰述。至一九七〇年七月，始全部撤回各院校。或勸我上課，我謝絕。一九七一年二月，我被派去參加標點《宋史》，其中最難之《禮志》、《樂志》、《律曆志》等篇均由我任之。但主其事者乃一不學無術之徒，不明古文之義，不知標點用法，妄自改易，錯誤百出。我力爭不得，乃憤而告退，又不許。此正「四人幫」勢盛之時，無可如何也。

其時，餘暇較多，撰述之時亦多，而中文系爲落實政策，乃將我之兩稿發還，我大喜過望，如死者

之復活也。不久，我已患冠心病而不自知。至一九七三年三月，《探原》全部脫稿，約二百三十萬字，引用書籍凡八百二十種，共七十五大冊，重四十斤，歷時凡四十年。我即向中文系黨支部書記報告，請予指示，但久未得覆。同年四月，由上海出版社之編輯介紹於北京出版社，旋得彼社負責人覆函云，兩稿正是中華書局之分工範圍，並囑酌寄數冊審閱，因將兩稿寄去六冊，後接彼社負責人來函略謂：「羅先生的《源流》一稿，已由有關編輯同志看過，他們認為羅先生經過多年研究，寫成此書，足見功夫很深，很有成就。但是作為第一批讀者，他們建議將講音韻的一部分刪去。」此議，我院教研組同事並不同意。惟我急欲出版，只有遷就照辦，再函詢彼社要否寄去，迄未得信。至《探原》一稿已隔兩年，彼社亦未作出決定，其時謠傳備戰甚急，我恐原稿散佚，不得已去函索回。遂又將原稿再校對修改一次，並編檢字與引用書目錄各一冊。一九七五年九月，我又調任編纂《漢語大詞典》工作。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上海市舉行追悼毛主席大會，我曾作古體詩一首，長四百餘字，張貼院內，觀者無不稱許。同年十月，我患大便秘血，幾殆。是月，「四人幫」之首惡被逮捕，舉國歡騰，我輩遂獲二次解放。一九七七年十一月，曾由老友吳文祺同志將兩稿介紹與上海古籍出版社，至一九七八年六月，彼社覆函云：「尊稿功力極深，至為欽佩，但以其中死字、僻字過多（按：函中所謂死字、僻字，都是最古的文字，拙稿旨在探原，自不得不研究之），甲骨文、金文更難描摹，從目前印刷條件來講，難以解決。現將原稿掛號寄上，請查收。」此兩稿在南北兩大文化中心之出版社均無能為力，其他可知矣。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常務委員與主席團成員。一九七八年三月，日本東京都書道教員訪華團前來上海師範大學開交流會，我曾參加接待。席上我先以籀文寫「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八個大字，

後又以隸書寫詩一首，詩用魯迅贈日本友人新居詩原韻，其句爲：「一衣帶水望蓬萊，今日歌吟更勿哀。放眼縱觀新世界，五洲動盪激風雷。」次年四月，上海與大阪舉辦書法交流會，先在上海，次在大阪，我曾以小篆寫毛主席詞句「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十字，參加展覽。一九七九年九月，我被任爲上海市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

先是「四人幫」之首惡被逮捕後，來從我習文字學者有十餘人，其中有報刊編輯、大中學教師與業餘愛好者，奚柳芳即其一也。我之教文字學也，先講文字學之基本知識，講義以許慎之《說文解字敘》與五百四十部首爲主，而以我所作之《說文解字探原自序》（以下簡稱《自序》）、《六書說》爲輔。又以我所注之《說文解字敘》爲參考資料。許敘先述我國之先期文字以八卦列結繩之先，講至此則以《自序》據《周易·繫辭》與孔安國《尚書序》所言，當以結繩列八卦之先。許敘次述文字創造之人爲倉頡，講至此，又以《自序》據所分析古代文字之結構而言，則斷定我國文字產生之時當在原始社會末期；創造文字之人乃勞動人民，至階級社會，才是知識分子。許敘次述「六書」之次序與意義，以「指事」列於首，又以「會意」列「形聲」之後，「假借」列「轉注」之後，講至此，則以《六書說》據文字發展規律而言，「指事」當列「象形」之後，「會意」當列「指事」之後，「假借」當列「會意」之後。許敘次述周、秦、漢之字體，常將古文、籀書、大篆混而爲一，講至此，則以《自序》據考證現存各種字體之同異，當以商之甲骨文爲古文，周之鐘鼎文爲籀文，秦惠文後之詛楚文、盪和鐘、秦公毀、獵碣文（舊稱石鼓文）爲大篆，秦始皇統一文字後之石刻、權量、詔版與許慎之《說文解字》均爲小篆。許敘次則批評當時之荒謬言論，講至此，則述《自序》評議清代文字學家之得失及近代學人之奇談怪論，以便對照。至一九七九年，我

院決定由我帶古文字學研究生兩名，九月上課。除研究生外，尚有各級選讀生五十餘人，大中學校教師與外地來滬進修之教師四十餘人，共九十餘人，前所未有的。第一學年我所講授者同上。第二學年，除繼續講授外，並指導研究生學習古代文字學專著與編寫《漢字源流》一書。第三學年，則以指導研究生撰寫論文矣。一九八〇年八月，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組織各省市各民族參觀團，上海市任我為上海參觀團團長，先赴內蒙古、東北參觀，後赴北京參加國慶活動，十月十四日返上海。

總我之一生，幼年即學書法，讀四書。稍長入中學，學英語及其他新學種。此外，又學金石詩詞繪畫。入大學後，又學商科等各項學科。此外，仍繼續自修舊日所學之文藝。少時即喜飲酒，愛古代音樂、昆曲，又好圍棋與內家拳術，所交游者，皆海上名師也。又好游歷名山大川，在大學時，曾往游南京、蘇杭與普陀山；在就業後，曾往游泰山、曲阜、故都；在抗日戰爭時，曾往游武夷、雁蕩；解放後，曾往參觀安徽佛子嶺水庫，又隨各民族參觀團參觀北京、東北、湖北、河南各大城市之工廠、礦山、公社與水利建設。一九七八年五月，又往韶山、廬山、井岡山參觀學習；最近又往內蒙古、東北參觀，所獲甚多。我有三子，長慶生，次胤生，皆工程師；次拯生，攝影師。有二女，長勵生，工程師；次敏生，中學語文教師。有四孫，長允和，復旦大學新聞系學生；次允平，技工；次允年、允高，尚在學。又有孫女允豐，亦技工。我生平頗尊孔子，但對彼之言行亦未嘗盡以為然。自學習馬克思、列寧文選與《毛澤東選集》後，始篤信唯物主義與共產主義。我為少數民族，因政府貫徹民族政策，我受黨的培養教育、關懷照顧，嘗謂：「我有生之年，皆報黨之日也。」今雖已七十又六，仍不敢偷安。在當初撰述《探原》之時，本擬二十年完成，再以二十年時間注釋《周易》、《尚書》。不意《探原》已費四十年，而今餘年日促，精力日衰，不能如願矣。

今我最憂慮者有二：一，《探原》與《源流》兩稿，北京、上海兩地之出版社既不能出版，我即向上海之主管機構與有關機構陳述，或無答覆，或雖答覆而不能解決問題；嗣又向北京之主管機構與有關機構陳述，亦或無答覆，或雖答覆而不能解決問題。據我所聞，老教授、老專家之著作，未能出版者甚多，將如何處之？二，我院文字學之繼承人，前既未曾培養，今雖在培養，仍恐青黃不接。十年內亂，青年對祖國之古代文化遺產，茫然不知。欲於二三年間完成文字學之學習研究，實不可能；而中年者雖較有基礎，但對古代遺留之專著與有關之古籍亦未嘗涉獵。我院有一名畢業生，年近六十，已是工人業餘大學教師，好文字學，肄業時既聽我課，畢業後亦常來問業。去歲我上課時，彼皆來聽課，意欲繼承我職。越二月，彼忽告我：「本欲繼承師職，今知其不能。」我問彼：「照我之講義講述，當有何難？」彼答：「照講義講述不難，但難在學生提問時，須當場答覆而又引經據典以證之，此則我所不能也。」試問，有相當基礎者尚如此，而相當基礎亦無者，又將如何處之？凡此二事，願能引起有關部門重視。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日

說文解字探原自序

昔人有言不讀說文解字不可謂識字。孰知雖讀說文解字亦不得謂識字哉！國余今日爲此書不僅使人識字不僅使人知文字創造之人文字產生之時代文字發展之規律與夫文字構造之方法且將使人於文字改革知所利用於古代各個社會之生活生產經濟政治文化教育風俗習慣之狀況有所考覽焉。今請依次論之。

周易繫辭下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則創造文字者不知爲何人。尚書序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則創造文字爲伏羲。呂氏春秋君守篇曰：蒼頡作書，韓非子五蠹篇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淮南子本經訓曰：昔者蒼頡作書，說文解字敘曰：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則創造文字者爲倉頡。荀子解蔽篇曰：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近人章炳麟曰：依此，是倉

頤之前已有造書者。而籀、石鼓以前，神農已知稼穡，伏羲以前，伶倫
 已作律呂也。夫人具四肢官骸，常動持莖畫地，便已縱橫以象，用爲
 符號，百姓與能，自不待倉頡也。……倉頡蓋始整齊書畫，下筆不容
 增損，由是率爾著形之符號，始爲約定俗成之書契。（章氏叢書檢論一卷造字緣起）
魯迅曰：但在社會裏，倉頡也不止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
 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史官一
 採集，便可以敷衍記事了。中國文字的由來，恐怕也逃不出這例子
 的。又曰：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後來卻一定爲特權者所收攬。（見外史）
外史則創造文字者又不止倉頡一人矣。聖則諸說孰是？曰：以馬克
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之學說證之，章、魯二氏之說爲是。

恩格斯曰：語言是從勞動當中並和勞動一起產生出來的。（從
到斯大林曰：語言不是某一個階級所創造的，而是全社會、社會所